

马步芳在青海

1931——1949

[美]默利尔·亨斯博格 著

崔永红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MA BUFANG IN QINGHAI PROVINCE MA BUFANG IN QINGHAI PROVINCE

马步芳在青海

马步芳在青海

马步芳在青海

译者前言

马步芳(1902—1975)是“西北诸马”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曾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先后兼任青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青海省保安处处长、国民政府军第八十二军军长、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是本世纪30至40年代统治青海地区的封建军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他曾出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一度势倾西北。马步芳及其家族统治青海长达40年,对青海的历史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对马步芳及其家族进行深入研究是青海乃至西北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已有多种,国外也在研究,我翻译的这本小书就是目前所见外国学者系统研究马步芳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本书是美国学者默利尔·亨斯博格(Merrill Ruth Hunsberger)博士于1978年在坦布尔州立大学(Temple University)完成的亚洲史博士学位论文,1986年由美国密西根州安亚伯国际缩微大学复印,内部交流。亨斯博格博士于1940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他20岁时到过香港,开始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喜欢阅读中国历史和哲学著作。196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他集中精力学习、研究汉语和中国及日本历史。1978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马里兰州大学台湾分校、坦布尔大学、艾德里安学院执教。1982年移居加拿大,1984年以来一直在加拿大沃特鲁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历史系从事中国及日本近现代史的教学,对中国西北

近现代史相当熟悉。为写《马步芳在青海》这本书，他曾于1970—1972年专程去台湾搜集资料，查阅了大量有关西北的书刊资料，又利用了台湾所藏国民党的档案材料，还与马步芳家族成员马继援、马呈祥等，马步芳旧时僚属赵佩、罗平、马绍武以及西北籍学者周开庆等人多次晤谈，还与马继援等有过书信往来。本书共10章，除4章属背景介绍和对一些重大事件的重点记述评论外，作者分列“军事”、“意识形态”、“行政管理”、“教育”、“经济政策”5个专章对马步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最后一章是对马步芳总结性的总体评价。与已出版的关于马氏的研究论著相比，此书的特点之一是紧紧联系中国30至40年代的历史大背景，注重拿马步芳与陕、甘、宁、川、新以及山西、广西等地的军阀相比较，在比较中突出马步芳的特点。作者还运用西方现代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及传记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作者在书中除较多地引用汉文报刊、书籍的资料外，还引用大量西文资料，包括外国政府文件、学者的论著、记者和官员的游记以及有关传记、年鉴等等，其中不少是我国学者不易见到的。

翻译并出版这本书，是因为它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对我们研究青海历史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外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也不无裨益。

本书的主要观点我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马步芳在青海实行的是“独裁政治”。无论是在军队中还是在行政管理系统中都贯彻任人唯亲的原则，“利用裙带关系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关键手段”，“他通过对青海商业和工业的垄断与民争利”。作者认为马步芳的垄断经济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40年代后期青海省军政所需经费主要来源于此。马步芳在“经

济上的垄断与在政治上的独裁是完全一致的”。作者认为,马步芳在意识形态上注重实用主义,他巧妙地利用伊斯兰教教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自己服务。他始终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不变,以此博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马步芳对国民政府的服从以保持自己对青海的统治权为条件。作者认为马步芳执政期间,一贯关注青海省的初等教育,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中等教育发展滞后,同时指出马步芳不愿培养较高层次人才是担心这些人将不利于他的统治。书中肯定马步芳在禁止种植和使用鸦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又指出,他利用青海省禁烟委员会收集鸦片,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对马步芳开展的扫盲教育和植树造林工作,书中作了适当肯定。作者认为马步芳的“六大中心工作”被标榜为以革新社会为目标,但“马步芳不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而是一个热衷于保护其既得利益的保守的军阀”,“马步芳像所有的军阀一样,注定要失败”,因为“他的思想和策略与国家发展、民族融合增进的时代潮流相悖”。书中不少见解,能给人有益的启示,如对解放前青海未能出现工业化原因的分析言简意赅,切中肯綮。书中还较多地引用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考察材料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其它资料,对马步芳剥削人民的本质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如指出“营买粮”制度完全是无偿征发;马步芳为养活庞大的军队,不断增加农牧工商税收,还低价收购羊毛等土特产,独占贸易,盘剥各族人民等等。我们认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客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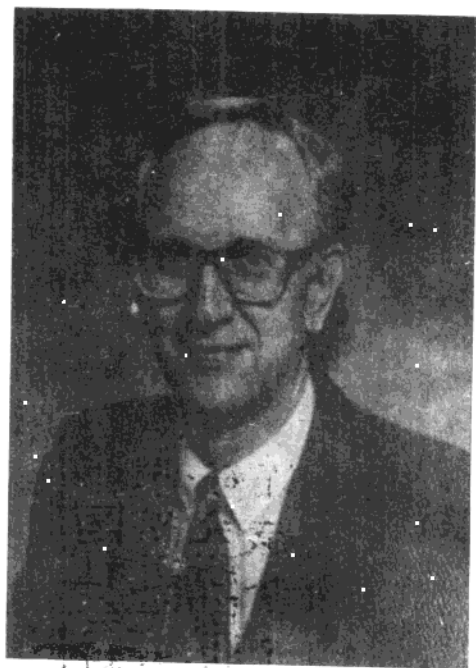
当然,作者作为一名足未履青海的外国学者,在接触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研究青海的历史,评价马步芳,难免有其局限性。由于受条件限制,作者未能很好利用大陆当时已有的关于西北诸马的有关资料。不过,在作者写这本书的70年代中期,以青海为

例，可资参考的资料确实不多。作者利用的材料有相当的部分来自受马步芳控制的《青海民国日报》，在台北他访谈的对象又主要是马步芳家族成员，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势必影响到作者据以得出的结论。例如对马步芳某些方面的介绍和评价，就直接引用了马继援等人的原话。在写到马步芳的征兵制度时，援引 30、40 年代来过青海的一些记者的片面意见，认为当时青海的征兵制度“优越”，“青海可供选择的职业很缺乏，因而增加了以当兵为职业的吸引力”。似乎穷苦老百姓乐于在马家军中当兵。这与当时盛行绳捆索绑的抓兵现象，各族人民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兵役的事实相去甚远。书中引用的西文资料固然珍贵，但其中与事实有出入甚至舛误之处也是存在的。除了材料的局限外，勿庸讳言，作者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思想方法等与我国学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书中史实和论述不够准确甚至失实之处在所难免，译者在个别地方加注作了必要的说明或阐明自己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在所有可以持异议的地方全都加注也是不可能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注意鉴别和分析。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我师赵盛世教授、吴均教授、李文实教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得到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省委党校的丁萍同志协助整理核对了部分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的陈小强同志帮助查了部分书目，青海人民出版社政史室的同志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书中翻译得不够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望专家指正。

崔永红

1994 年 8 月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著者 默利尔·亨斯博格(Merrill Ruth Hunsberger)博士近照

目 录

序	(1)
导论	(3)
第一章 青海	(8)
第二章 诸马的兴起	(20)
第三章 孙殿英事件	(40)
第四章 军事	(57)
第五章 意识形态	(80)
第六章 “六大中心工作”	(97)
第七章 管理	(115)
第八章 教育	(126)
第九章 经济政策	(138)
第十章 军阀残余马步芳	(151)
尾 语	(158)
附录	(159)
参考书目	(164)

序

中国在形式相同的帝制统治下进入 20 世纪,这种皇帝统治制自从公元前 221 年以来除有某些短暂的中断外一直实行下来。随着时代的前进,无论如何,中国和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中国许多重大事件开始了,包括依次发生的北洋军阀统治、国民政府统治和现行的共产党人的统治。在 1912 到 1949 年期间,军阀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 1912—1927 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军阀随心所欲地操纵时局,1928 年到 1949 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即军阀残余时期,尽管军阀的作用有某些减弱,但他们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本书考察和分析了 1931—1949 年马步芳在青海省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中国表面上团结在国民政府的旗帜之下,但在小天地里,在基本问题的诸多方面,地方首脑们仍有较大权力,并阻挠中央对其进行控制的企图。马步芳的情况,反映出了国民政府对地方军政首脑们的控制所能达到的程度。

完成本书的写作离开许多个人和组织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的。我感谢坦布尔大学的援助,使我 1970—1972 年的台湾之行成为可能,在台湾我得到了大量用于这项研究的资料。我感谢爽快地给予我时间和知识的为数众多的台湾人。对黄达寿(音)教授的殷勤款待、仁慈之心、以及对我工作上的帮助,我表示最大的感激。他给予我非常有价值的协助和支持,使这项研究成为令人愉快的经历。马步芳的儿子、原青海军队中的将军马继援,在好多场合是亲切和善的主人,他在同我的会见交谈中,提供了有

关青海事务的知识宝库。马呈祥也是原青海军队的将军，会见中他提供了大量有关青海军事方面的资料。赵佩原是马步芳的文职下属，在几个要害问题上，他给予的帮助最大。罗平是马步芳的妹夫（罗平曾任循化县县长，是丑辉瑛的丈夫，与马步芳无亲戚关系。——译者），也为我提供了几条有用的资料。周开庆，原来居住在甘肃，曾写过一本记述中国西北的书，他为我提供了几种非常有用的著作的目录。除会见交谈所得到的材料外，国民党档案馆的丰富资料是本书写作材料的基本源泉。蒙李云汉（音）惠允，我得以使用这些资料，使我感谢不尽。张大军（音）是中央党部党史会党干事，他不仅提供有关著作目录，还帮助我理清某些历史事件，给予我的帮助是十分巨大的。我还感谢国民党档案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其中秦丹（音）还协助我细读他们拥有的报纸和杂志。有了他们的慷慨援助，我才能够自由利用在青海出版的唯一一份报纸——《青海民国日报》。此外，我要感谢学位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舒培·奥卡摩特（Shumpei Okamoto）、华尔多·亨利奇斯（Waldo Heinrichs）以及主席邱（S·M·Chiu）。他们情愿在这篇论文的准备阶段阅读并给予批评指导。他们的耐心和很高的学术造诣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当然，此文中所有的缺点疏漏都由我负全部责任。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玛比尔，没有她在精神上和财力上的支持，完成这项工作也是不可能的。

导 论

詹姆斯·雪里敦(James Sheridan)在《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涯》一书中将20世纪中国军阀主义的发展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1916—1926年,1926—1928年,1928—1949年。第一阶段(1916—1926年)是“纯”军阀主义阶段,“……进行战争,玩弄政治花招成为军阀获取权力和财富的专门职业。”^①从袁世凯之死到北伐战争开始这一阶段,不同的军阀集团争相控制北京政府,与此同时,各个军阀极力保持和扩大他们作为独立的省或地区的首领的自治权。这10年期间出了6个国家首脑,25个相接续的内阁。但没有哪个军阀或派系能保持住对国家政府的控制。各个政府的首脑只不过是不同军阀的工具,军阀们图谋控制政府以便获得外国贷款和其它的财政的和政治的支持^②。军阀们永远企图扩大统治地盘,增加税收来源,因而混战不已,造成兵荒马乱。他们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军事本领。国家的和平安定来自国家政府,可是军阀们极少留意于此。

这种混乱局面为第二阶段提供了背景,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预示着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当时诸派军阀为控制越来越不关痛痒的北京政府而打得不可开交,中国南部的国共盟军发动了对北方的讨伐。北伐战争的目标是多方面的:1)废止军阀操纵中央政府,打倒军阀主义;2)建立一个有能力在中国

① ②詹姆斯·雪里敦:《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涯》,(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页。对三阶段的简明论述参见第6—19页。

驱逐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3)提供在中国可以实行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使中国能与其它国家平等交往^③。然而，一个关键性的事实限制了北伐的成果。在调解和处理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接途经地区的军阀时，允许军阀完整无损地带领他们的军队进入国民革命军。这样的策略使国民党得以暂时避免打很多仗，流很多血，但这样做的结果使很多军阀有了继续反对国民党在中国实现政治军事统一的能力，这一点尤为重要。一个例子便是1929—1930年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大战。还有一些军阀其所据地盘北伐军没有直接途经，如四川军阀和西北诸马等，直到南京十年之末的1937年仍未受到丝毫触及。

南京政府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定性地对付在华拥有特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使大多数西方国家不要提出其在华经济利益的要求是可以办到的，但要阻拦日本对中国的剥削是不可能的。这样，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军事以及政治事务都受到日本的持续地严重干涉。国民政府无力有效解决外国人继续干预中国内政问题的原因容有诸端，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本身存在许多问题：政治腐败、裙带关系、缺乏连贯条理的政治思想体系、不够成熟、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觉察不够^④。

③ 参看詹姆斯·雪里敦：《分裂中的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共和时代，1912—1949》，（美）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版第164—182页；劳埃·伊斯曼：《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美）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2—13页。

④ 雪里敦：《分裂中的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共和时代，1912—1949》，到处可见；伊斯曼：《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到处可见。

第三阶段(1928—1949年)是军阀主义残存时期^⑤。按照想象,军阀似乎被北伐战争消灭了^⑥,但是事实上它一直存在到了1949年。这一阶段军阀活动的范围比北伐前小了。企图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军阀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中遭到失败,如1929—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企图推翻蒋介石的失败^⑦;1933—1934年福建军阀发动的反抗国民党的失败^⑧;1936年广西军阀和陈济棠联合反对中央政府的斗争的夭折^⑨。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中国东半部已击败由军阀发动的全部反抗。然而无论如何,这不是说南京十年期间中国东部已彻底消灭了军阀。由于并发的两个事实,使军阀残余仍然存在:一是中央政府专力于与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二是日本入侵中国。尽管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妨碍了国民政府在山东、山西、河南和另外几个地方根除残存的军阀,但东部军阀公然向中央政府挑战的力量已被消灭。

中国西北地区残余的军阀仍然存在,由于这里远离首都,交

⑤ 雪里敦:《分裂中的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共和时代,1912—1949》第57—106页,183—206页;雪里敦:《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涯》第1—30页;罗伯特·卡普:《四川和中华民国:地方军阀和中央权力,1911—1938》,(美)新哈芬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11页,62—86页;道纳尔德·季林:《军阀:阎锡山在山西,1911—1949》,(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03—117页。

⑥ 鲁森·毕安科:《1915—1949年中国革命的起因》,(美)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4页。毕安科是近代学者中持中国军阀被北伐战争消灭了的观点的代表。

⑦ 季林:《军阀:阎锡山在山西,1911—1949》第110—115页。

⑧ 伊斯曼:《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第85—139页。

⑨ 雪里敦:《分裂中的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共和时代,1912—1949》第193—197页。

通不便，国民党的组织薄弱，蒋介石与该地军阀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很浅，所以中央政府征服西北军阀的能力大受限制。1937年国都由南京迁至重庆，中央对这些军阀不能施加足够影响的情况有所改变。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试图加速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四川、青海和甘肃军阀的自治权开始有某些丧失。

国民政府不再象南京十年期间那样谨慎了，那时中央对青海、甘肃、宁夏的事务以茫然的神态保持容忍，满足于听任西北诸马为所欲为而几乎不加干预。但1938年后，重庆政府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同时为了尽量避免上述省区向日本或邻近的陕西共产党靠拢，感到在西北军阀面前提高自己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重庆政府发布了一份涉及到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施政纲要，以此来发展并加强与这些省的关系。

本论文是对马步芳成为青海军阀直至1949年共产党胜利为止这一段历史的研究。1931—1937年期间马步芳的行动与1916—1926年期间其他军阀的行动形式相似。他之所以能如此行动是由于青海地处偏远，也由于南京政府以为攻击西北不太重要。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1933—1934年的孙殿英事件，马步芳与其它人联合起来努力反对南京政府将孙安置到青海西部，以此使青海免于受南京的直接控制。马步芳利用他的军队不仅影响孙殿英事件的解决，而且镇压其它与自己相匹敌的例如马仲英那样的野心勃勃的军阀。1931—1937年间，马步芳在西北的行为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南京的制止。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步芳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中央政府试图增加其在西北的影响显得更紧迫。首先，由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遭受了重大的领土损失，国民党感到自己统治的领

土比过去更重要了。西北地区先前被南京政府忽略,自 1937 年之后重要性增加了。其次,青海显得重要性增加了是由于其位置跨甘肃河西走廊两头,又挨近容易发生变乱的新疆省。总的说来,中央政府对马步芳在某些领域的独立性的限制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事实显示,马步芳仍保留着对青海事务的很大程度上的控制。

第一章 青 海

青海省位于中国西北,周围是新疆、西藏、西康、四川和甘肃诸省。除西藏外,都有杂居的好多民族如藏、蒙、汉等。这些民族在本文研究的时期(1931—1949)和好地共处于变动的国家。尤其是青海省,这个地区地理环境险恶,山势高峻,降雨量少,主要依靠畜牧经济^①。

中国西北在1928—1937年间不愿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国家控制,原因之一是这里与国家首都的距离遥远。狄娜·拉利(Diana lary)很有说服力地认为,南京十年期间(1928—1937),相对于南京,各省的自治程度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些省中离南京最近的是被中央政府控制最严的,这些省位于第

① 任美镔:《西北问题》,桂林:科学书店1943年版,第67页。这个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认为,美国大平原的气候和中国西北十分相似。

关于西北地区人口分布的情况可以从以下青辑的统计数字中获得,青辑之文题为《西北人口与面积》,载《现代西北》第3卷第4期(1943年5月15日)第28页。

省名	面 积	人 口	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
甘肃	1 147 956	5 762 190	5.02
宁夏	911 616	704 886	0.77
青海	2 294 848	4 599 364	2
新疆	4 947 288	2 575 289	0.56
总计	9 302 198	13 641 729	

(上引数字,是当时学者的估计而已,有些与实际相差甚大,读者利用时须注意——译者)

一圈的是：浙江、江苏、安徽——自从第一批被占领以来，就被南京紧紧地加以控制。位于中间一圈的省有：江西、湖南、福建、河南——被控制的程度有所减弱，因为这些省离南京稍远一些。位于外圈的省是：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山西和山东——在南京十年中，实际上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有时甚至确实是敌对关系^②。

西北诸省比起这些外围省分来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国民政府无力控制西北决定性事务的状况，造成了这里的政治“真空”，打破真空步入半自治的军阀有：青海的马步芳，新疆的杨增新和盛世才，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刘湘、杨森，宁夏的马鸿逵，甘肃西部的马鸿宾（应为甘肃东北部及宁夏海固地区的马鸿宾——译者注），甘肃西部和新疆的马仲英等。这些人缺乏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信奉，他们不是靠恳求逐鹿者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是靠请求中央政府的居中调停，而是通过直接的军事行动来解决争端^③。中国边疆人民和内地人民之间存在着某些隔阂。在历史上，内地人民曾企图把他们“开化的”文明强加给沿边人民，这促成了对这些地区更难以驾驭的因素。最后，国民政府拒绝承认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利益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最终引起这些地区的不安定。1929年国民党

② 狄娜·拉利：《1929—1936年国民党派系中的广西派》，（英）伦敦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63年第1—2页。

③ 下列书刊可作为了解西北的入门读物：艾伦·惠廷和盛世才：《新疆：小卒还是轴兵？》，（美）东兰辛密西根州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周开庆：《西北剪影》，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罗伯特·卡普：《四川和中华民国：地方军阀和中央权力，1911—1938年》；道柯·巴恩特：《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美）纽约，腓特烈·普兰杰公司1963年版；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938版，由约翰·发尔班柯介绍，1961年在纽约哥罗夫出版社再版。

第三次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大会批驳了认为中国存在不同民族的论点，对面临的困难，则指责满人和大小军阀。会议许诺将带来五族在自由联合基础上的大统一，这种许诺无异于否认诸少数民族的存在^④。蒋介石发表他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包括各种具有不同习惯、风俗、宗教信仰、居住地区的“种族”，然而所有的人都居住在中国政区以内，具有相同的人种、血统，争论民族问题就等于贬抑中国面临的其他更重要的问题^⑤。

青海的自然地理可以被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青海西南部几乎全是由河流谷地构成的，大多数谷地与中国西部肥沃的谷地相同，不同的是青海的谷地山地更高些，更干旱些。与亚洲内陆的大草原和盆地完全相似的柴达木盆地位于全省东北谷地的西面。该省南部青藏高原与西藏东部和中部也十分相似^⑥。

青海东北主要是由汉族和回族定居，他们的经济主要建立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之上^⑦。青海东部是回族和汉族聚居之地，这

④ 乔治·摩斯利：《中国边疆地区最近的国际政策》，收入杰克·哥莱编辑的《现代中国政治形式的研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301、310 页。

⑤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及中国人之经济理论》，（美）纽约，罗伊出版社 1947 年英文版第 3 页、10 页。

⑥ 查理斯·格利尔：《青海省，文化边境的变革》，（美）华盛顿大学未刊文学硕士论文，1969 年，第 1 页；周开庆：《西北剪影》第 12 页；马伟：《青海地理概要》，载《现代西北》第 4 卷 1 期（1943 年 1 月 1 日）第 82 页。

⑦ 周振鹤：《青海》，台北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第 115 页；巴恩特：《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 181—183 页。中国大多数回族是阿拉伯人和中国汉族人的混合种族。回族群体是过去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与阿富汗之间的地区迁徙到中国来的。从河州回族中涌现出马步芳、马鸿逵以及其他西北回族的重要军事人物。追溯他们的祖先，至少有一部分是约于公元 8 世纪经陆路来到中国的阿拉伯雇佣兵。